

## 我给孙大总统当警卫

雷 彪<sup>①</sup>

·辛亥革命中，我曾给孙中山先生当过贴身卫士，跟随中山先生经历了长期的革命运动。直到一九二一年陈炯明叛变革命，我在广州参加战斗突围后，才离开了孙中山先生。

一九〇九年，我在南京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当士兵，那时我们第九镇称为新军，每个战士都有一定的进步思想，在同盟会十六字纲领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和中山先生提出的“三民主义（民族、民权、民生）”思想教育下，我们第九镇全体官兵看到了我国的光明和前途。那时徐绍桢是我们第九镇新军统制，三十三标标统为俞大鸿。洪承典那时是我的排长，他与我关系非常密切。因洪承典反对清朝政府，被清政府通缉，他离开祖国到日本找到中山先生，追随他参加反清革命运动。在我和洪承典两人分离之时，我送给他十块银元，作为对洪排长的一片心意。后来洪承典跟随中山先生回国后，担任沪军总司令和我们第七师的师长等职务。

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，新军第八镇在武昌起义，风声所播，举国响应。我们第九镇全体官兵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，个个心情激动，斗志昂扬。九月十八日，我们第九镇在徐绍桢统制的指

<sup>①</sup> 雷彪生前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，一九八五年逝世。

挥下，在雨花台举行起义，由于没有充分的战斗准备，在子弹缺乏情况下，被张勋的江防营击败。

第九镇攻打南京之役失利后，我们退回镇江，组织了苏军、浙军、镇军、淞军和沪军等革命力量，合成江浙联军，徐绍楨为联军司令。十月四日开始攻打南京天堡城。那时南京流传着这样的兵谚：“要得南京城，先攻天堡城。”辛亥光复南京之役，以攻打天堡城最为激烈。那时，我在苏沪先锋队当一名敢死队员，我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，喊着“万众一心，我们汉族存亡在此一举”的口号，向前冲锋，浴血苦战。最后把张勋的江防营击垮，张勋也夹着尾巴跑了，南京城胜利光复。后来我编入陆军第二师（原七师）二十六团充职业掌旗员，洪承典为我们的师长。

一九一二年元月，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，黄克强被任命为陆军总长兼参谋长。我由洪承典师长挑选担任了总统府卫士。那时我们共有四十名卫士，卫队长是郭汉章，总统府传令官是许德宽、许德惠、蒋汉臣、汤达等。我是四十名卫士中年龄最小的，因我个子小，又比较灵活，中山先生见到我非常喜欢，后转任中山先生的贴身卫士。

记得第一次看到中山先生时，他和蔼微笑着招呼我坐下，热情地问长问短：“小老倌，你几岁了？哪一年参军的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今年二十岁，是宣统元年参军的。”大总统笑着说：“你的老皇历可要改改了，还说什么宣统不宣统的。”大总统又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？”我说：“因为看不惯清朝政府的腐败，才跟着你大总统干革命的。”中山先生听了很高兴，他拍拍我的肩亲切地说：“小老倌，要好好干，将来一定有前途。”

后来我经常和中山先生在一起，担负保卫他的光荣任务。我常常为中山先生站岗放哨值班，晚上，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，有

时一直到天亮。

大总统生活十分俭朴，待人也很和蔼，百忙中还体贴入微地关怀我们，每一个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不会忘怀。记得有一次大总统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叫雷长瑞？”我点点头。中山先生说：“你的名字听起来不顺耳，我给你改个名字好吗？你就叫雷彪吧，虎字加三撇就能飞啊！”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。从那天起，雷彪这个名字就在卫队中传开了。

后来大总统要离开南京了，他在临行时命令我和传令官二人在宁沪一带探清形势，秘密地做地下工作，并等待命令。

一九一五年，中山先生在上海组织了“讨袁军”。那时中国出现了两种政治势力，一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，另一是以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势力，双方斗争十分激烈。我是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的战士，在香山路先生的老住宅我又见到了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夫人。先生亲切地对我说：“小老信，你长大了，长高了。”又说：“有一件重大的事叫你去完成。”我说：“一定完成好任务。”他严肃地对我说：“这个任务主要是夺取袁世凯海军手中的主力舰‘肇和’号，此事是这次讨袁中的一个重大行动。”我听了点点头，心想中山先生对我这样信任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。

十二月五日那天，我们二十余人组成敢死队，乘夜深人静，划着渔船偷驶到停在黄埔江中的“肇和”军舰旁。我第一个攀上军舰，在我们内线的配合下，解决掉岗哨，又把所有袁军统统俘虏，发起联络炮声，与另一队袭击袁军所控制的高昌庙制造局的我方战士联系。他们主要任务是夺取枪支弹药，武装我们在法租界内的三万余讨袁军战士。但因袭击高昌庙的一路未能成功，我们没有听到联络回音，只好弃舰撤退。后来我才知道夺取高昌庙制造局的

一队因消息走漏，二十余人全部壮烈牺牲。

当时中山先生并没有对革命丧失信心，他对我们说：“革命不会一帆风顺，要经受锻炼，对这次行动中牺牲的战友，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。”说到这里，中山先生也流了泪。

一九二一年四月底，中山先生在广州由非常国会选为大总统，我在总统府见到了中山先生及夫人。大总统对我说：“雷彪，你今年可能有三十岁左右了吧，结婚了没有呀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没有结婚，等到大总统领导北伐胜利之后再考虑。”大总统笑着说：“你跟随我多年，对革命事业也作出了贡献，年龄也大了，还是在警卫营待命吧。”

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一天深夜，陈炯明背叛中山先生，叛军包围了观音山总统府，步步进逼，形势危急，我也被炮声惊醒。我们警卫营与叛军作了顽强的战斗，在中山先生离开了总统府后，我们也突围疏散了。

在我离开广州之前，中山先生还亲手送我一百元钱，叫我安排生活。这时我紧握着中山先生的手半天才迸出一句话：“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。”然后挥泪告别。从此我再也没有机会和他在一起。

在新中国成立后，宋庆龄副主席在一九六二年还给我来了信，关心我的生活和工作，并对我家的生活作了具体安排。回想在过去的年代里，孙夫人和中山先生时刻关心我们。那时中山先生很忙，好多文件、电报、信件都由孙夫人拟稿，并负责处理国内外的大量机密文件和其它日常工作。有时她派我转呈文件，总是耐心细致地关照，不要出差错。她坚定、忠诚、工作严谨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